

三 峡 考 古 研 究 丛 书



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 考古学研究

李映福◎著

Sanxia Diqu Zaoqi Shizhen De
Kaoguxue Yanjiu

四川出版集团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三 峡 考 古 研 究 丛 书

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 考古学研究

李映福◎著

Sanxia Diqu Zaoqi Shizhen De
Kaoguxue Yanjiu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考古学研究 / 李映福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6
(三峡考古研究丛书 / 孙华主编)
ISBN 978-7-80752-630-8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三峡—城镇—文化遗址—
研究 IV. ①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9805 号

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考古学研究

李映福 著

责任编辑 张玉亮 陈 礼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30mm×170mm
印 张 20.125
字 数 4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630-8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Early Cit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period archaeology is mainly focused on tombs, cities, and rock cave temples. Especially, nearly all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cities is concentrated on the capital cities of each dynasty. Thus, the research of the basic social structures, the city or town level, is still a weak link till today.

This book uses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as example, provided a multi-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ies from Tang dynasty to the middle Northern Song. As a historical period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 the book used abundant new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Through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vas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o keep this book's structure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alysis. The book introduces the layouts, architectural spaces, cultural outlooks, types and periodization of the typical cit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systemically, and established a preliminary space-time structure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ities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is region. It divides the early cit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into three periods, the early period, the formative period, and the developing period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in that region, including administration buildings, temples, workshops, kilns, stores and so on. This book points out that all of the early cit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were built beside rivers, used docks as their extended spaces, and well related to the other settlements around there which formed a special spatial settlements' form of that region.



三峡地区

..... 早期市镇的考古学

This book widely combines th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study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social economics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by both the cultur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and the physic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in details. Especially some important facts, such as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size at the mid-late Tang dynasty, northern immigrations to the southern region, the affection of the well salt' s distribution, and so on.

,

长江三峡工程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代“三峡考古研究丛书”总序)

宋新潮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面向大海，西南是连绵不断的山地。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由若干地理单元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体系。在古代中国人的概念中，这个地区是人类得以生息繁衍唯一的土地，因此称为“天下”；又以为它是四面环海，所以称为“四海之内”。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中国古代文明也最初形成于境内的两大河流，一条是黄河，另一条就是长江。

传统观念认为，黄河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中心地区，这是因为公元前 2000 年前传说中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建立在黄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这里在历史上也是被称为“四海之内、天下之中”的中心，这也是“中国”名称的由来。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夏王朝根据其山川、河流、土壤、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等情况，将其统治的地域划分为九个行政单元，称为“九州”。“九州”中的扬州、荆州、益州就分布在今天的长江流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长江流域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包括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发现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前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宗庙祭祀遗址。在长江中游发现了公元前 6000 年前的中国最早的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以及稍晚一个时期的江陵阴湘城等古代城址。同时也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发现若干新石器时期的城址，特别是 1986 年成都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的重大发现。虽然两个祭祀坑的年代可能晚到公元前 12 世纪至公元前 10 世纪，但这一发现超出了以前所有人



的想象，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认识长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作用和地位。

长江作为我国第一大河流，全长 6300 多公里，流经 10 余个省区市，流域面积约有 180 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长江流域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1100 毫米，年平均气温 6~20℃。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口有 4.8 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强。长江既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今天中国基础最为雄厚的经济区。但由于地理和气候等原因，每当夏季长江流域暴雨如注，大量的泥沙顺着千沟万壑涌入大江，使江水猛涨，造成水患频发。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公元 7 世纪到 20 世纪初近 1300 年的时间内，长江共发生水患 223 次。因此，长江水患成为中国历代执政者的心腹之患，治理长江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

经过近六十年的设计、论证，1992 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长江上游下段西陵峡河谷（湖北省宜昌市境内），控制了长江上游 100 余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可以有效的调节进入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综合效益，形成长达 650 公里的峡谷水库区，水库面积 1048 平方公里，总库容 393 亿立方米。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为配合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论证，考古学家曾多次组织对三峡地区进行调查。国家正式决定建设三峡水利工程后，国家文物局积极组织全国 30 多家考古、地质、古生物、人类学等专门机构，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复查和试掘工作，并完成了 32 册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移民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工程涉及文化遗产点 1087 处。从 1985 年湖北秭归朝天嘴和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开始，国家文物局陆续调集了全国 110 多家专业研究机构，对三峡工程淹没区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抢救工程，累计有近 7000 多位考古、建筑、规划、地质、测绘、水文、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直接参与了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程的工人累计也多达近十万人。目前，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已接近尾声，近二十多年来，文物工作者不仅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也为研究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料。

下面我从七个方面简述一下三峡工程的考古发现。

一、三峡地区是我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

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Edgar)就在三峡地区的长江沿岸采集过旧石器,但这些采集品脱离原生层位,年代和文化难以判定。之后中国学者也对这个地区进行过调查,发现一些有确切层位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1985 年中国科学院的黄万坡领导的考察队在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的龙骨坡,发现了人科化石和石制品,年代被测定为距今 200 万年左右,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广泛关注。三峡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程全面开展后,共发现 68 处更新世考古和化石地点,其中 38 个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列入发掘计划。目前已进行 27 次系统地发掘,发掘和勘探面积近 17000 平方米,出土了 3 万余件石制品和大量的动物化石,为研究三峡地区更新世人类的文化、技术发展和生态环境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已有的发现我们可以初步认为:

1. 龙骨坡的古人类发现表明古人类可能在早更新世便出现在三峡地区,这为研究东亚地区古人类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大批旧石器遗址在三峡地区的发现表明,更新世晚期先民们已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开发。

2. 古人类所利用的石料多为石英砂岩的河卵石,打制石器的方法也主要是锤击法和摔碰法。因此,石器的类型相对单调,主要以砍砸器为主体,并有少量的刮削器,加工粗糙简单,个体粗大,多以砾石和石核为毛坯,属于中国南方砾石工业主体特征。

3.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过渡性特征,以及远古人类的迁徙移动,个别遗址出现带有北方时期工业特征的小型石核、石片和石器,反映远古时代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往来。

4. 在一些遗址中发现打击石器与初级磨制石器和原始陶片共生的现象,这对研究古人类从打制石器技术向磨制石器技术和制陶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生活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变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之初,人们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仅局限于库区东部大溪文化的个别遗址,库区西部新石器文化的尚属空白。三峡工程



涉及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多达 84 处，其中许多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丰富的资料积累和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对三峡地区距今 8000 年到 4000 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发展序列及其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主要居住在长江两岸的阶地或与支流交汇形成的台地上，渔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大约在距今 8000 年或稍后一个时期，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人们，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定居在今天重庆以东的长江岸边。这一时期代表性的遗址是湖北巴东县楠木园遗址和重庆丰都县玉溪遗址。遗址出土的陶器为红褐色，器型单一，主要是釜、碗、杯以及少量的罐、支座等。石器也多为打制的石斧、石铲等，其年代在距今 7500 至 7000 年间。这是三峡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文化特征也表现出相对的一致性。大约从距今 6000 年开始，三峡地区明确以瞿塘峡为界。形成东、西两大系统的文化。东部地区的文化表现出与长江中游地区古代文化明显的联系，而西部地区似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系列。从三峡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过程和文化因素，以及文化间的彼此关系，似乎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来自不同地区族群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情况：大约在距今 7500 年到 6000 年，长江中游地区的族群是三峡库区的主体民族，这一时期三峡地区绝大多数地区成为了长江中游文化圈的组成部分；在距今 6000 年或稍晚一个时期或来自长江支流的岷江和白龙江上游族群辗转来到三峡，占领了三峡库区瞿塘峡以西的地区，并与东部地区族群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彻底改变了三峡库区的文化格局。从这时起逐渐形成了以瞿塘峡为界，以东为长江中游文化体系，以西为四川盆地文化体系的基本文化格局。在此后的历史时期东部族群势力再也没有进入瞿塘峡以西的地区，而西部也仅在三星堆文化最强盛的时期，曾占有整个三峡地区，并跨入了江汉平原边缘地带。

三、寻找三峡地区的一个远古民族——巴人

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公元前 316 年以前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一个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古国，即古代巴人建立的政权。三峡地区也曾是巴人的重要活动地区，传说中的巴国都城“平都”（今重庆丰都县）和“江州”（今重庆市区）都在库区的范围内。巴人素以勇悍善战和能歌善舞而著称于史，并在公元前 11 世纪参与北方地区的周武王灭商的战争，传说巴人最为强大时，其势力控制了包括整个三峡地

区在内的四川盆地东部。三峡工程建成蓄水后，古代巴人活动的区域绝大多数将沉沦水底。因此，在三峡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启动之初，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就明确将巴文化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经过几十年的工作，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发现了若干古代巴人的文化遗址或遗存。遗址面积最大者可达10万平方米左右，发现了陶器明显含有当地新石器文化的传统，又有夏商文化的影响因素，其文化面貌总体与成都平原地区的文化相近。在经济生活上，渔猎业非常发达。发现的一些巴人的遗址现象，表明可能与早期盐业生产有关。考古学家还找到了巴国在被灭之后的贵族墓地，在大多数墓葬中随葬青铜剑、戈、钺等兵器，直观地体现出了巴人勇悍善战的气质。一些大墓中出土精美的青铜器，也印证了巴人中的贵族在当时享有的特殊地位和经济实力。

四、汉晋时期三峡库区繁荣的见证

汉晋时代是三峡库区最繁荣的时代，这种繁华延续到了六朝前期。从六朝后期开始，三峡地区开始走向衰落，重庆库区三峡考古新发现证实了这段历史。

汉晋时期的遗址在三峡库区发现最多。已经揭露出多处这个时期的城址和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这些遗址中，城市遗址最重要的是重庆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也就是两汉至六朝的胸忍县城的城址。该城建在沿江的山坡上，绵延千米，各功能区在不同地段，相对独立，很有特点。城址中的衙署遗址还保存着有石雕装饰的房屋台基，在衙署旁还有东汉末期胸忍令景云功德碑，是三峡库区古代地方城市演变的重要例证。汉晋墓地在库区发现极多，有多处连绵不断的大型家族墓地，其中最值得注重的是重庆忠县乌杨镇汉晋墓地群。这些墓地分布在彼此毗邻的沿江山包上，每个墓地的墓葬都排列得很密，墓地的沿用时间也很长，有的墓地还树立有石阙、石表、石兽等物。根据出土的石刻文字并结合文献可知，这些墓地中有张飞义释严颜故事中的严氏家族、《晋书·儒林传》之首文立的文氏家族等著名大族，这除了有助于研究汉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制度，同时为认识这一时期三峡地区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古代三峡地区重要的战略资源——盐

古代巴人以及整个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除了地理区位上的特征外，这一地区还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三峡考古



的发现,我们有理由相信盐业的开发以及对这项战略资源的控制,或在古代三峡地区民族的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地质年代的三叠纪时期,四川盆地及三峡地区实际上是一个半封闭状态的内海盆地,此后由于气候的干燥,海水蒸发以及地质演变,这一地区形成丰富的盐矿储量。三峡地区处于这个“盐盆”边缘,盐矿埋藏较浅,加之水流下切,地下盐卤多天然外露。古代巴人有可能就是最早利用和开发三峡盐业的民族。传说中巴人的先祖是通过与盐水之神的战斗才占领了这一地区。因此,人们推测巴人长期控制了三峡地区盐业资源,使他们得以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夹缝中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在三峡库区的若干遗址中都发现与盐业有关的遗迹或遗物,这些遗址的年代也可上推到公元前 11 世纪以前。这些遗址中都发现大量单纯的圜底花边罐和尖底杯等陶器,这类制盐陶质器皿的堆积厚达 3~4 米。在忠县中坝遗址发现大面积的窑场遗存,出土的陶器几乎全部是圜底花边罐和尖底杯。我们曾支持北京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考古学家合作,对四川盆地古代制盐工业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他们发现三峡地区的这类遗址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古代盐业遗址特征非常相似。

在遗址中还发现有储卤池、窑灶等制盐遗迹。从这些遗址的规模,人们或可以断定这里是古代巴人食盐和财富的重要生产基地。长江中下游一带历史上并不产盐,要获取食盐就多来自三峡地区。因此,人们推测古代长江中游的政治集团与巴人发生的战争或许与对这一地区的食盐需求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在整个历史时期,盐业一直都是长江上游三峡地区和四川盆地的最重要产业。

六、三峡也是古代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

三峡地区作为联系上游四川盆地与中游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在河谷两岸的岩壁上修建开凿了栈道。考古学家在三峡许多地段都发现有古代栈道和纤道的遗址。这些栈道就地取材,构筑形式灵活多样,是古人克服险阻而创造出的特殊道路。另一方面,三峡地区河谷狭窄、水流湍急、险滩不断,许多河段在木船航行时,需用人力拉纤才能通过。这些断续的栈道、纤道与通航的河道相接,从而构成了三峡内部以及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交通网络。因此,在古代三峡地区也始终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和走廊,不论是在远古的



史前时代，还是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三峡地区在文化上都表现出多样因素共存的特征。特别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三峡以外地区的人群不断迁入或通过三峡，以及各时期中央政权对三峡通道的有效控制，进一步加快了这一地区的文化融合，考古学家还发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时期就已进入三峡地区。在东汉延光四年（125）的墓葬出土的摇钱树上，就有释迦摩尼（佛陀）坐像。这应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有纪年佛教图像，类似的图像曾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也曾有过发现。我们还不能断定此类佛教图像是通过哪条道路进入长江上游地区的，也不能断定佛教是否已作为独立的宗教信仰，还是仅仅是附庸于中国传统宗教。但可以肯定，长江上游可能是最初接受佛教信仰的地区之一，而且可能通过三峡地区传到了长江中游一带。在湖北鄂州公元261年的墓葬中发现的陶佛像。或许能够证明这一推测。

七、水文考古的发现

为配合三峡水利工程的设计论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与水利专家合作，对历史上长江洪水、枯水的相关资料进行10余次全面的考古调查。在三峡库区河段共发现古代洪水题刻174处，枯水题刻4个河段。最早的洪水题刻是公元1153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题刻内容比较简单，一般是“某年某月大水至此”，或“水淹在此”等。根据古代文献记载，长江上游从公元7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的1300年间，共发生洪水230多次，平均每5年一次。但从发现和保存的古代题刻的纪年“水标”来看，三峡地区仅有7次可以确切定量的洪水年份。水利专家通过数学模型推算，洪水的流量多都在每秒82000~95000立方米，最大是1870年的洪水，已高达每秒105000立方米，也是三峡地区800多年最大的一次洪水。这些发现对三峡水利枢纽大坝的设计起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三峡大坝“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来水，就是依据1870年每秒110000立方米的洪峰流量。

考古专家在宜昌中堡岛等遗址的发掘中还注意到，遗址地层堆积常常有若干层的洪水淤沙层。根据考古学与出土物的测年，人们得知的三峡库区最早的一次洪水大约发生在距今7000年左右，此后在距今5000~4000年前后还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洪水，这于中国历史上传说时代的水患可以相互印证。

三峡地区发现4处枯水期石刻题记，一般都刻在江边水下凸起的高石梁上，



枯水时才暴露水面。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涪陵白鹤梁的题刻，它位于长江偏南岸的大江之中，自西向东，全长 1600 余米，平均宽度约 15 米，每年冬春季偶然露出水面，有题刻 160 段，记载了自 764 年至 1950 年之前约 1200 年间 72 个枯水年份。题刻多以“石鱼”为水标，用以描述江水高低。在这一题刻群中，最低枯水位发生在 1140 年。这对于研究长江水文、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这些题刻也同样是古代艺术品。这些枯水题刻在水库建成后将永远留在水下，因此为了保护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经过多年论证，采取水下原址保护措施。即在水下建造一个无压力保护覆室，人们从岸上通过斜坡交通廊道进入保护覆室的参观廊道，以直接观看古水文题刻。目前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已于 2009 年 5 月对外开放。

长江三峡库区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从 1997 年开始，到 2007 年就已基本结束，大量的考古报告或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新的资料大大改变了我们对长江三峡库区历史的认识，需要有一批研究者对这些资料进行消化和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尽快公布于众。我们知道，长江三峡库区的地下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只是这项工程的前期工作，通过发掘获取的大量考古资料如果不进行归纳、综合和比较分析，不将这些资料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充分挖掘出来，这项工程就完成得不完整。在参加长江三峡库区考古会战的队伍陆续离开后，研究的重任就主要落在了长江三峡库区的重庆市和湖北省的考古学家身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作编写的这套“三峡考古研究丛书”，就是这些单位在三峡库区田野考古工作的继续。我衷心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将这套丛书一直编写下去。并希望有更多的参与过长江三峡田野考古的研究者参与到三峡考古研究中去，将我们的研究推向深入。

序

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墓葬、城市和石窟寺考古历来是三大主干；而在城市考古研究中，又以历代都城的研究占据主流。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迄今为止对于社会基础组织结构的市、镇一级遗址的考古研究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李映福先生的大作《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这一环节，也是近年来中国古代市镇考古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时期城镇考古研究向前发展进步。

李映福先生的这部新著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书的研究视角，始终放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市镇形态的功能与结构演变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从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对唐宋时期市镇的发展、形成及其特点展开多方位、多层面的观察，并以三峡地区作为例证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可喜的是，作者虽然立脚点是放在三峡，但其眼光却并不仅仅局限在三峡，他首先是对中国市镇的起源、发展的基本脉络进行勾勒，再将三峡置于这个宏大的背景下面加以考察，因而，从本书的一开始就展示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

第二，作为一部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专著，作者充分利用大量三峡考古的新材料（其中包括他本人曾经亲自参加的三峡明月坝遗址的考古资料），将全书的研究构架始终建筑在对考古材料所作的分析与解读之上，通过对考古材料点、线、面的研究比较，系统而深入地对各座市镇的平面布局、建筑空间、文化面貌、类型与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初步建立起三峡地区唐宋时期市镇的一个考古学时空体系，回答了若干考古学的学术问题。例如，作者对这些考古出土的房屋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的分析，根据遗存情况将其区分为衙署、寺院、作坊、窑址、店铺等不同性质的建筑物，再对其不同时代加以区分，认



为三峡地区的早期市镇建筑分别草创于唐代早期、形成于唐代中晚期至五代，至北宋早中期发展最为显著。在其布局特征上，作者经过考古资料的排比得出这些市镇的布局特点均具有面临江河、以码头为其外延空间形成主、次级的布局关系，并与周围的聚落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三峡地区特点的聚落空间形态的总体性认识。这些新的观点和研究结论，都是富于创见性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这些成果都是以考古资料及其深入的研究作为坚实的支撑，绝非空泛之论。

第三，作者的研究虽然是从考古材料入手，但却并不局限于考古材料，而是广泛地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对三峡地区以市镇经济为特点的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显示出作者具有的深厚历史素养和人文情怀。例如，作者在探讨三峡地区唐宋市镇的成因时，既考虑到当时的人文地理条件——尤其是唐代中晚期人口规模的扩大、北方人口向南迁移的这个特殊因素，又考虑到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特点，如其中井盐资源的分布可能对市镇分布所产生的影响、交通条件、市镇功能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等等，都下了很大功夫加以阐发，对于这些市镇形成、发展的内部原因与外部动力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说明。

第四，作为一部考古学的论著，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在书中附有大量精心绘制的线图，其中大到反映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水道的地图、各处市镇遗址的分布图、聚落结构示意图，小到一尊出土的佛像、一片瓷器碎片。透过这些细致入微的线图，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作者所的文字和思想，让读者在阅读考古学论著时，既能充分感受到它的科学与严谨，同时也能享受到其中的考古之美与灵动之魂。

当然，作为市镇考古学的新著，也还留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例如，在三峡地区唐宋市镇遗址当中十分重要的重庆云阳明月坝遗址，李先生曾经亲自参加过发掘工作。书中介绍遗址中发现数量最多的遗物，是大量的陶瓷器残片，它们来自中原和长流中下游地区的各个窑口，如长沙窑、湘阴窑、耀州窑、越窑、龙泉窑、邢窑、定窑、湖田窑、涂山窑等，多达数万片。从其产源地分析，它们最大的可能性应当与当时的商业贸易有关。但是，它们究竟是主要的从外地销售而来的商品种类呢，还是传统的江海运输中船舶仓底的“压仓之物”（当然也是一种商品）？当地居民们又是以何种商品与其进行商贸交换的？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并未做出正面的解释，只是笼统的表述“瓷器所包含的信息成为反映市镇社会生活形态、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交通运输、贸易网络的关键材料”。这或许是出于谨慎和小心，但却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期

待作者将来给予回应。

李映福先生大学毕业之后便留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工作，他为人低调，处事平和，幽默风趣，和老师 and 同学们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对外学术交流也开展得十分活跃。在学术事业上，近年来他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中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铁器考古、三峡考古等。每一次读到他的新作，都为他不懈的钻研精神和强烈的创新意识所深深感动。这次他的新作即将付梓，因为我曾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所以他执意请我为本书作序，一方面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一次学习的好机会，所以就把上面这些初步学习后的初浅体会奉献给本书，聊以为序。同时，我也借此机会预祝李映福先生在未来的研究生涯中不断取得新的佳绩！

霍 巍

2010年4月22日

前言

市镇是介于州县城市与乡村聚落之间的最基层一级的政府组织所在地，是城市的基础细胞，是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很不平衡，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围绕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展开的，对州、县、府、监等地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址的发掘和研究非常少，市镇、聚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几乎是空白，偶尔有一些材料见诸报告，也大多是基建发掘的随工清理，或者是以早期遗存为发掘对象而顺便触及的遗存。可以说城镇、聚落遗址的考古材料不仅零散，而且对材料的整理也不够系统，报告往往也非常的模糊、简略，可想而知，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也是相当薄弱的。

影响历史时期市镇考古学发展的因素很多，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大量的包括市镇、聚落在内的唐、宋文化层被后世所破坏，能找到的、保存较好的遗址较少；第二，史学界普遍弥漫的那种依靠丰富的、世界独有的文献体系就可以究明汉唐历史的思维，也对考古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得我们在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时，往往存在着“古不考三代之后”、“重史前，轻周后”遗址的思想；第三，一般人的指导思想是连京都城市的形制都弄不清楚，却大量投入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发掘研究什么市镇、村落，稍嫌本末倒置。

20 世纪末开始的三峡大坝工程，为历史时期市镇考古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按照规划，三峡大坝建成蓄水后，江水自坝前抬升距离将上延到重庆江津市，水域里程达到 630 多公里，淹没陆域面积近 600 平方公里。在大坝蓄水范围内，展开的全域性的文物调查和考古抢救发掘工作，发现和出土的资料